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

I



人民文学出版社

Л. Н. ТОЛСТОЙ

ДЕТСТВО ОТРОЧЕСТВО ЮНОСТЬ

据 Л. Н. ТОЛСТОЙ,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20 ТОМАХ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60) 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 第1卷/(俄罗斯)托尔斯泰(Tolstoy, L. N.)著;谢素台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ISBN 978-7-02-008386-2

I. ①列… II. ①托…②谢… III. ①托尔斯泰, L. N. (1828 ~ 1910) —文集②三部曲(作品) —自传体小说 —俄罗斯 —近代 IV. ①I512.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55625 号

责任编辑 温哲仙

装帧设计 何婷

责任校对 李晓静

责任印制 李博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5766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232 插页 68

印 数 1—3000

版 次 2013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8386-2

定 价 890.00 元(全十七卷)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总 序

列夫·托尔斯泰的创作和艺术

我哪天都在想：“艺术永恒，人生短暂。”假如来得及把你所理解的东西写出百分之一就好了，结果却只写出万分之一。^①

托尔斯泰这段话写于1865年，当时他正致力于创作《战争与和平》。在这之后，他又写出了《安娜·卡列尼娜》等许多杰作。虽则他一生中把大量时间花在教育事业、社会活动以及政论和宗教论文等上面；虽则他在世界观激变之后羞于写艺术作品，长期搁置了生花之笔，而他所留下的文学遗产，已达百卷；他所达到的艺术成就，已是光芒万丈，炳照千秋了！

诚然，我们也不为贤者讳。托尔斯泰的世界观是有许多弱点的。他自己早年（1855）在日记中说过：“我将在‘历史’的封面上题词：‘我无所讳言’。仅仅不公然撒谎是不够的，还得力求不从反面撒谎——默而不言。”^②在论述他时，我也将遵循“无所讳言”这一原则。

鉴于目前西方某些文论往往忽视一个作家的创作和思想的关系，忽视现实主义的艺术成就，因此，在这里我不是作概括的分析，

① 《列·尼·托尔斯泰与俄国作家通讯集》，莫斯科，1962年，第261页。

② 《列·尼·托尔斯泰论文学》，国立文学出版社，莫斯科，1955年，第19页。

而是沿着托尔斯泰的思想发展轨迹逐一、固然是简略地谈谈他的作品,来看两者的联系,最后再粗浅地谈他几个方面的艺术成就。

—

在整个世界文学史上,恐怕很少作家像托尔斯泰那样,在其大量创作中贯穿着自传性因素。除了众所周知的伊尔杰尼耶夫、聂赫留道夫、奥列宁和列文以外,《袭击》中的志愿军、《伐林》中的士官生、《家庭的幸福》中的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烈和皮埃尔、《安娜·卡列尼娜》中的谢尔巴茨基老公爵,甚至谢廖沙,《舞会以后》中的伊凡·瓦西里耶维奇^①,还有《魔鬼》中的叶夫盖尼·伊尔杰尼耶夫、《光在黑暗中发亮》中的萨雷采夫等人物身上,都这样那样程度不同地闪现着作家本人的身影。当然,我们不会也不应简单地把作品中的人物等同于作者。托尔斯泰自己说过,《童年》中“凌乱地混合着”他童年时朋友的故事和“我的童年的故事”。托尔斯泰的秘书、托尔斯泰传记作者尼·尼·古谢夫还指出:“在托尔斯泰的许多艺术作品初稿中通常在相当程度上存在着自传成分,而在后来的稿子中自传成分常常冲淡,而且部分地被作者勾销了。”^②当然,我们也不会忘记,托尔斯泰的创作不是表现自我,而主要是“仍然停滞在半农奴制度下的俄国”的“历史生活”的反映(列宁语)。问题在于,托尔斯泰是“实践的人”,在创作中不只限于作社会历史的“书记”,而是与其中某些人物一起探索解决现实矛盾的道路。自传因素不一定在于作品中的事实和作家的经历相吻合,主要在于同某些人物的思想情绪的肖似。从这个角度来说,托尔斯泰的创作的发展史,同时

①② 尼·尼·古谢夫:《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传记资料)》(1828—1855),苏联科学院出版社,莫斯科,1954年,第4页。

也是他的心灵的发展史。

高尔基说:托尔斯泰的作品“是 19 世纪一个强烈的个性所从事的一切探索的文献性的叙述,这—个性旨在寻找自己在俄国历史上的地位。”^①我们可以补充说:这种思想探索是在追求思想上的和谐,追求个人与社会的和谐。追求这种和谐是文艺复兴以来欧洲进步作家的共同理想,不过,作为“19 世纪所有伟人中最为复杂的人物之一”(高尔基语),他身上充满来自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个人的社会地位和性格特点所构成的“惊人的矛盾”,他的和谐的理想有自己独特的内涵。

托尔斯泰的创作生涯近六十年,而主要“属于 1861 至 1904 年”。这是农奴制改革后俄国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时代。在当时,资本主义“怪物”像一把双刃剑插入农村,既鲸吞贵族地主的地产,又扫荡农民经济的“旧基础”。贵族地主和农民都面临双重的威胁:对于前者,一方面是农民几百年积累起来的愤怒海洋,另一方面是“新主人”在“樱桃园”里不断响起的丁丁斧声;对于后者,一方面是农奴制残余的魔爪,另一方面是原始积累带来的破产、饥饿和流离失所的新灾难。这是一个矛盾尖锐而又错综复杂的时代。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出身名门世族。他自幼在上层圈子中长大,早年曾染上贵族社交界的某些恶习和贵族阶级的偏见。与其他一些俄国大作家不同,托尔斯泰不仅拥有田产,而且大部分时间还亲自经营。直到世界观激变前夕,在 1871 和 1878 年他还先后购置了六千五百俄亩(约七千公顷)土地。我们并不会简单地理解普列汉诺夫所说的,他“一直到晚年也始终是一个大贵族”^②(普列汉诺夫是就他的思想认识不彻底而言的)。但应

① 高尔基:《俄国文学史》,新文艺出版社,上海,1957 年,第 503 页。此处据俄文作了一些改动。

② 《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人民出版社,北京,1983 年,上册,第 733 页。

该看到,直至十九世纪 70 年代末以前,与他的生活条件相适应,他的创作是带有本阶级的鲜明印记的。

当然,托尔斯泰的思想是相当独特和复杂的。他从十四岁起就开始思索人生的意义,“要为他人而活着”。在十九岁时更认识到,人不是孤独的,而是“在社会中生活”。“假使人人追求自己的福利”,将会“产生秩序的混乱”;反之,“假如人人力求自己本人的完善,秩序就无论如何也不会遭到破坏……”^①追求个人完善,要为他人而活着,确实像他在 50 年代末说的,“永远成为我的信念”。但这里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一方面,他是贵族地主,又因长期居住农村,熟悉农民的贫困以及他们对地主的不信任和敌意,他早就知道,“存在着奴隶制的当代,有教养的地主不可能过合理的生活。”^②也就是说,他要个人完善首先要解决地主和农民的关系问题。何况他的清醒的头脑对俄国社会和贵族阶级的腐败不能不感到厌恶。另一方面,由于立场的限制,也由于卢梭思想的影响,他只追求个人完善,只主张从道德上而不是从社会经济方面来变革社会。与此同时,出于对战胜本阶级的新兴资产阶级的憎恶,以及对那因资产阶级侵入农村而陷于破产的农民的同情,他完全不能接受资本主义。于是他把目光转向过去,向往他理想化的宗法制的遗风,长期沉湎于天真的幻想,寻求地主与农民和睦相处的道路,希冀从此获得自己内心的和谐。从《一个地主的早晨》到《安娜·卡列尼娜》,都贯穿着这种幻想,只是随着时代前进和社会矛盾明朗化,这种幻想渐趋破灭,绝望的色彩日益加浓,最后,在七八十年代之交俄国社会革命运动的激荡下,他完成了世界观的激变,转到(而且仅仅只能转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来。

然而托尔斯泰的心灵始终没有获得宁静。他深刻地批判当时

① 《列·尼·托尔斯泰全集》,国立文学出版社,第 1 卷,莫斯科,第 229 页。

② 《列·尼·托尔斯泰论文学》,第 28 页。

俄国社会的“恶”，但他的不以暴力抗恶的说教并不能消灭社会的“恶”，也不能阻止这种“恶”的力量继续使用暴力，他对自己的教义日益感到怀疑。1905年，俄国爆发了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宗法制农民大都受到这次革命的影响，有的还直接卷入革命运动的洪流，托尔斯泰因自己同他们思想上有了分歧而悲观失望，同时他对自己的特权地位和言行矛盾更深感不安。从1881年起他曾多次企图离家出走（这在他的《谢尔盖神父》、《复活》、《活尸》和《光在黑暗中发亮》等作品中也有所反映），最后于1910年11月10日他走出决定性的一步，离家出走，希望通过同自己环境决裂来实现和谐的理想。不幸的是，这位82岁的老人，立时在途中患上肺炎，于20日在梁赞-乌拉尔铁路的阿斯塔波沃站逝世。他终于以自己的生活悲剧来了结思想悲剧。

二

托尔斯泰在少年时代就曾从哲学探索人生意义。他认为：“人生的目的是促进人类全面发展”，^①而在他看来，个人的完善是改造人类的途径。也许他正是抱着这个目的，在喀山大学求学时曾对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感兴趣，而从喀山大学退学^②后，曾在自己庄园里试行改善农民的生活以及自己和农民的关系，但因农民不信任而没有进展。失望之余，他在莫斯科过了一段放荡生活，旋即感到厌倦，于1851年随长兄尼古拉去高加索从军，就在这里他开始踏上了创作道路。因此苏联学者鲍·伊·布尔索夫认为：托尔斯泰为了达到他追求个人完善的目的，先是研究哲学，继而付

① 《列·尼·托尔斯泰全集》，第46卷，第31页。

② 托尔斯泰于1844年9月考入喀山大学东方系，读阿拉伯-土耳其语文专业，一年后转到该校法律系，至1847年4月，因不满大学的教育措施，辍学离校。此后，他没有再就读其他大学。

诸实践,最后从艺术创作领域找到实现这个目的——人生使命的手段。^①实际上,哲学家——实践家——艺术家,既是他走向文学创作的先后历程,也是他毕生致力的三个方面,他是三位一体,目的都是为了实现他在青年时代给自己提出的任务,他正以此截然不同于那些把创作当作目的而走上文学道路的作家,同时,他一生的多方面活动也大大缩小了他在艺术创作领域的成就。^②

公开发表的第一部作品《童年》(1852)和陆续发表的《少年》、《青年》的主题是主人公(大体上是作家自己)个性成长,同时是走向个人完善的过程。《童年》写的主要只是两天时间(一天在庄园,一天在莫斯科),以主人公过自觉的生活开始而以其失去童心结束。《少年》的内容,据作家自己说,是“孩子在童年之后逐渐腐化以及他在青年时期以前的改善”;《青年》则写主人公对美、幸福和美德的向往,最后一章“我失败了”既指考试,也指这些追求的失败。作品写作时期离故事发生时间已隔多年,作者的观点有了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三部曲中有两个“声音”:一个是过去,即主人公当时的观感,一个是现在,即作者写作时的态度。尽管这种态度是批判性的,对于《童年》中宗法制的牧歌式的主仆关系,作者仍然一往情深;至于《少年》和《青年》中所表现的某些民主倾向,后来作者自己坦率地承认,是他写作时所没有的,是不真诚的。^③

和上述三部曲同时创作的有战争小说《袭击》、《伐林》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这些小说与其说是写战争,不如说是写在战争中的人的精神状态和品质。《袭击》开头部分说道:“只怕应该怕的,不

① 《列夫·托尔斯泰。1847—1862》,莫斯科,1960年,第22—78页。

② 在新版《列·尼·托尔斯泰全集》(百卷本,科学出版社,莫斯科,从2000年开始出书)中,文学作品只有18卷,此外为手稿17卷,论文20卷,日记13卷,书信32卷。

③ 参阅帕·伊·比留科夫《列·尼·托尔斯泰传》,柏林,1921年,第1卷,第72页。

怕不该怕的,就是勇敢的人。”这个“勇敢”的定义是他的全部战争题材作品中品评人物的重要标准。作家歌颂朴实平凡但却坚毅勇敢的士兵和普通军官,鄙夷外表威武、内心渺小、充满虚荣心和名利欲、漠视士兵伤亡的贵族军官。小说一反俄国过去战争文学的浪漫主义传统,在描绘战士英勇沉着的同时,并不隐讳他们的恐怖感和战争的残酷性。作家说:小说的主人公“就是真实”。^①

这些战争小说也基于作家的亲身经历。正是在他亲自参加的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中作家目睹人民的朴素的爱国主义。所以他在该书中说:“史诗”的“主人公就是俄国人民”。他早已看到贵族们意志薄弱,缺乏毅力,在战争中他加深了这种认识。这段时间内写的《台球房记分员手记》和《一个被贬谪的军官》同样反映了贵族的生活空虚和道德败坏。作家原来希冀这次战争能使统治阶级得到道德上的复兴,使俄国社会中各阶层的目标趋于一致,可是这一幻想落空了。

塞瓦斯托波尔陷落后,托尔斯泰于1855年底来到彼得堡,作为文学界的新秀受到热烈欢迎。从《童年》起他一直在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刊物《现代人》上发表作品,但他与车尔尼雪夫斯基却格格不入。^②当时是俄国社会激烈变化的时刻。克里木战争显示了人民的力量,而战争的失败又暴露了沙俄政府和农奴制度的腐败。继沙皇尼古拉一世自杀后,亚历山大二世即位,他看到农奴制改革势在必行,决定自上而下进行。托尔斯泰个人于

① 《列·尼·托尔斯泰论文学》,第25页。

② 总的说来,在当时他对彼得堡文学界的三个集团——斯拉夫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持不同的态度。对斯拉夫主义者,他是否定的。对自由主义西方派,他的态度比较复杂:他受过该派代表人物亚·德鲁日宁等的影响,但对自由主义的某些见解则持讥笑态度。对革命民主主义者,他的态度是矛盾的:他反对他们的政治活动,但却肯定他们是人民的真正捍卫者,是时代的真正活动家。参阅《列·尼·托尔斯泰的创作》(论文集),国立文学出版社,莫斯科,1959年,第30—32页。

1856年曾多次拟定解放农奴的纲领,并在自己的庄园内试行。在这个时候他写成了于1852年开始构思的关于一个俄国地主的小说,即《一个地主的早晨》。它其实可以说是《童年》等三部曲的续篇,是他未完成的《成长的四个时期》的第四部分。据他的秘书、他的传记作者帕·伊·比留科夫说:这部小说的内容是作家于1847年间的亲身经历,但其中也夹杂着作家写作此书时的活动和感受。小说真实地描写了农奴制下农民的贫困和落后,展示了地主与农民间不可弥合的鸿沟。但是,主人公行为的动机虽则是鉴于农民的赤贫,而主要却是身为地主的他自己对他们的责任。造福农民是希求自己同农民的关系的和谐,首先是自己内心的和谐,这其实是当时、甚至80年代以前托尔斯泰创作中的一个重要思想。

1956年举国上下要求改革的气氛曾使托尔斯泰抱有各阶级一致行动的幻想,而随后兴起的农民起义和社会运动却使他感到威胁。他的文学观和创作都因此产生过某些变化。上文谈过,他曾一度接近自由主义者作家、批评家亚·瓦·德鲁日宁等人,接受他们的“纯艺术”观点,反对文学中的暴露倾向,反对为政治的艺术。在《一个地主的早晨》发表前他删去描写富农和官吏胡作非为的章节,也是这种倾向的例证。不过,在当时他仍然肯定英国作家萨克雷等的讽刺作用,他自己未完成的剧作片断中也不乏讽刺色彩。关键在于讽刺什么,暴露什么,当涉及社会重大问题时,他是望而却步的。这也正是他同革命民主主义者在文学观上分歧之所在。

托尔斯泰于1857年第一次出国,到过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德国等国家。资本主义文明使他认识到俄国的“丑恶”和“野蛮”,以致他回国后“久久地与厌恶祖国的情感作斗争”。^①但他始终不能

^① 《列·尼·托尔斯泰论文学》,第38页。

承认资本主义对当时俄国封建农奴制而言有其相对的进步意义。这也表现于当时作品中。早在《两个骠骑兵》里,他把父辈描写得高于子辈,欣赏老图尔宾放荡不羁和慷慨豪迈的封建骑士精神,而鄙视小图尔宾工于算计和讲求实利的资产阶级习气。对于他的《卢塞恩》(旧译《琉森》),论者通常都肯定其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这像他对小图尔宾的讽刺一样,确是作品的有力的一面。但作家却一概否定资本主义文明。如果拿《卢塞恩》和《阿尔伯特》对照,更可看出作家的偏见。鲍·伊·布尔索夫中肯地指出,前者基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生活,因而持严厉的批判态度,描写的中心是客观现实;后者基于俄国生活,虽也批判,并非完全否定,所以着重写艺术家及其心理。^①俄国社会当时远远落后于西欧,为什么作家不愿正视现实呢?不能以爱国的情感来解释。涅克拉索夫在给他的信里说:“您目前在乡下过得很好,所以您不明白为什么要愤恨。……难道这里让人愤恨的理由还少吗?我们只有更加愤恨,我们才能更加爱……自己的祖国。”^②

他徘徊在十字路口。既看到俄国的“恶”,也想改变现状,可是反对暴力,认为以暴力同恶斗争,将会使恶增加,因为在他看来,任何的暴力都是“恶”。他把俄国看成一片“泥泞”,自己面临的抉择是“沿着这片泥泞往上爬或是绕弯走……”^③他选的是绕弯走,即“哲学(不是研究,而是来自荒唐的真正内心的要求)、宗教和艺术”,而主要还是艺术。在一封信里他写道:“……在俄国全是丑恶、丑恶、丑恶。……幸而还有生路,这就是精神的世界,艺术的、

① 《列夫·托尔斯泰。1847—1862》,国立文学出版社,莫斯科,1960年,第274—275页。

② 《列·尼·托尔斯泰与俄国作家通讯集》,文化艺术出版社,北京,1988年,上册,第40—41页,第35页。

③ 《列·尼·托尔斯泰全集》,第60卷,第232页。

诗歌的和可留恋的世界。这里无论任何人,无论警察局长,无论村长,谁也不会打扰我。”^①艺术的、诗歌的和可留恋的世界,再加上大自然,就是他这几年创作的主要领域。如果说《阿尔贝特》遁入艺术,那么《三死》便是遁入自然。固然,《三死》也不乏批判因素,如其中描写贵族太太的虚伪做作。然而在作家看来,越接近自然就越幸福,因此,树木之死比农民之死更安详些。

遁入爱情和艺术的思想集中表现于《家庭的幸福》。小说有自传性质。但它与其说是作家的爱情故事,不如说是他的精神写照。写作期间他的一些书信和日记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小说写女主人公由新婚的热恋、暂时的迷误到最后的悔悟、与丈夫和好。潜在的主题是主人公困扰于生活风波和遁入个人小天地。小说之所以用女主人公来叙述,并着重刻画其内心感受,也是为了避免涉及社会矛盾。这是在“纯艺术”思想支配下写成的不成功的作品。作家早在1857年4月的一封信中曾说:“宁静是心灵上的卑鄙”。^②而在1859年10月,《家庭的幸福》刚刚发表之后,他在给亚·瓦·德鲁日宁的信里谈到:“看来是不会再写作了。”他痛苦地承认:“……生命短促,在成年时期浪掷生命”去写这类作品“是问心有愧的”。^③他甚至要向《俄国导报》索回该小说,准备将其第二部分的校样付之一炬。

在这部小说之后他懒于写作,主要从事其他活动:为农家子弟兴办学校,创办教育杂志《雅斯纳亚·波良纳》^④,并在农奴制改革中担任和平调解人,这些活动使他进一步接近农民,并对改革后的农民生活有所认识。此时写成的小说《波利库什卡》可以说是其产物。的确,较之《一个地主的早晨》,这个作品的批判因素有所

① 《列·尼·托尔斯泰论文学》,第38页。

②③ 《列·尼·托尔斯泰全集》第60卷,第231页,第308页。

④ 教育杂志《雅斯纳亚·波良纳》于1862年开始出刊,至1863年出版第12期后即停刊。

削弱,但它不仅描写了农奴的悲惨命运,而且揭示了农奴与地主间的深度对立。地主太太对波利凯依(波利库什卡是他的小名)的信任并不能改变农奴总的说来不被了解和信任的境遇,因此他在丢失巨款之后深知无以自明,只能一死了之。小说还突出表现了新的社会关系的象征——金钱的罪恶。

完成于1862年的《哥萨克》颇能反映农奴制改革前后托尔斯泰的复杂思想。主人公奥列宁厌弃莫斯科社交界生活,并为逃避债务而去高加索,同作家本人于1851年底去高加索的动机颇为肖似,小说构思开始于1852年也非偶然,但书中流露的很多是写作时(1858—1859)的思想情绪。奥列宁陶醉于高加索的大自然,而生聚于斯的哥萨克,这个尚未完全开化、尚无阶级对立的部族,尤其是玛丽亚娜和叶罗什卡,不啻大自然的化身,与文明社会截然对立。作品里有卢梭思想的痕迹,有对上流社会虚伪的批判,有平民化的意愿,也有为他人而活着才是幸福的想法。但是作家把上流社会的一切丑恶现象都看作文明、教育(亦即资本主义文明)的恶果(这是他有代表性的观点),要从半开化的哥萨克寻求俄国的未来,则是反对社会进步的乌托邦思想。而且奥列宁要改造自己以融合于这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亦即使自己适应外界而不是触动外界,因而仍然是“绕弯走”。当社会斗争激烈的时刻,高加索不啻世外桃源,是可以获得心灵宁静的避风港。值得玩味的是:在一份手稿中,奥列宁得到玛丽亚娜的爱情,定居于高加索。从这方面看,《哥萨克》与《家庭的幸福》有其内在的思想联系。

从《童年》到《哥萨克》不过十年,托尔斯泰已在俄国文坛崭露头角,批评家奥夫夏尼科-库里科夫斯基指出:“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在文学创作的初期,托尔斯泰就显示出第一流的艺术才华,并在屠格涅夫、冈察洛夫、涅克拉索夫、皮谢姆斯基这样一些作家

的行列中,占有一席之地……”^①可是对托尔斯泰来说,还只是小试牛刀。如果说在50年代,他“暂时还从‘真人’,从自己的观感出发”,因而只局限于写亲身经历的“军事题材”与“地主题材”,^②那么,在六七十年代,继《哥萨克》之后,他突飞猛进,进而广泛地反映历史和社会生活,写出《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两部史诗式巨著,他的创作进入全盛时期。同时,这二十年也是他的世界观开始逐渐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早在1856年,托尔斯泰曾拟撰写《十二月党人》。他在1858年的一份笔记中说:只有贵族(而不是政府)从叶卡捷琳娜时代起,在文学中或是在秘密的和公开的会社中,以言词和行动为农奴解放作了准备。他们因此被流放或处绞刑。^③他谈的这些优秀贵族的代表人物主要指十二月党人。1861至1862年他写成该小说的开头三章,以后曾再次回到这个作品上来,但始终没有完成。其原因是内在的:托尔斯泰不能接受革命,又幻想人民能在贵族领导下一致行动。而十二月党人却与此相反,既要进行革命,却又远离人民。

在《十二月党人》开头部分,他称1856年为“伟大的难忘的俄国民族复兴的年代”,认为当时大家都努力探索并企图解决“新而又新的问题”,写作、阅读和议论方案,都想矫正、消除和改变一切,“所有俄国人像一个人那样,处于难以形容的喜悦之中”。虽则这段文字读来令人感到有点讽刺味道,但举国上下一致行动的理想始终萦绕于作家脑际,而这一理想的实现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如民族矛盾当前,才有可能。当然,这种可能,只是在想象、思想中,也只能在自己的创作中。因此他很自然地转向1812年的卫

① 《俄国作家、批评家论列·托尔斯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94页。

② 鲍·米·艾兴包姆:《列夫·托尔斯泰》,第1卷,(50年代),激浪出版社,列宁格勒,1928年,第127页。

③ 《列·尼·托尔斯泰全集》,第5卷,第267—268页。

国战争,撰写《战争与和平》。小说之所以从1805年开始,作家还有另一考虑:他不能只写1812年的胜利,而不写1805年的失败。

苏联学者米·谢·古斯不无根据地指出:《战争与和平》与屠格涅夫的《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在同一时期写成,三位作家都在这个历史严峻转折时期思考俄国的命运,三部长篇小说的中心问题都是时代的英雄问题。^①当时俄国解放运动正处于平民知识分子代替贵族领导社会运动的时期。而托尔斯泰却回到过去,回到世纪初,正是希冀有皮埃尔和安德烈那样的优秀贵族来担当领导社会运动的当代英雄。事情不是孤立的。小说写于农奴制改革后反动势力嚣张、进步力量备受迫害的严酷时代(1863—1869)。虽说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与托尔斯泰家里被宪兵搜查(因涉嫌与流亡国外的赫尔岑联系)发生在同一天,但此后两年,当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狱中写了歌颂“新人”(即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小说《怎么办?》以及他受到死刑威胁的时候,托尔斯泰却写出讽刺“新人”、“虚无主义者”的喜剧《一个受传染的家庭》(1864)。正在这个时期,托尔斯泰燕尔新婚,沉醉于甜蜜无比的庄园主的家庭幸福之中,这同此前,农奴制改革前夕、社会运动高涨之际,他为大厦将焚、贵族面临“要土地还是要性命”的抉择而忧心忡忡,适成鲜明的对照,从中可以参究当时他的思想立场。

然而事情还有另一方面,他当时思想是矛盾的。他对当时的社会是不满的,他转向历史上的优秀贵族,正由于他对当代贵族阶级的深感失望。他反对革命民主主义者主要是反对他们所主张的革命途径。而且他同情农民,赞许他们的淳朴善良,并且认识到:“俄国的力量不在于我们而在于人民。”^②这些想法充分表现于《战争与和平》之中,足见他的贵族立场有一定的变化。

① 米·谢·古斯:《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和形象》,文学出版社,莫斯科,1962年,第260页。

② 《列·尼·托尔斯泰全集》,第17卷,第30页。

在创作《战争与和平》之初,作者原拟写“自由的人们”(即贵族)的历史,^①写1856年携眷归来的十二月党人。成书后他在“尾声”的一份手稿中说,他是“努力写人民的历史”。^②从准备写贵族到写“人民”,并不意味着构思上的根本变化,而是因为当时他的“人民”概念实指民族,即“历史地形成的稳固的人们的共同体”。^③不过,这个“人民”大抵而且首先是指代表民族性格的农民,也包括具有这种民族性的优秀贵族。因此对他所说的,在《战争与和平》中他所爱的是“人民的思想”^④应作较广泛的理解。

人民本身在小说中并不出现于前景,但也决非消极的背景。作品的中心是1812年的卫国战争,人民力量的代表是士兵和普通军官,其中最突出的则是图申、季摩亨、杰尼索夫以及吉洪·谢尔巴特。如果说在1805年的两次战役中官兵们都表现了果敢镇定,表现了“谦逊的”英雄精神,那么在1812年,在敌人铁蹄蹂躏祖国的危难之秋,他们全体身上都燃烧着有敌无我的烈火,乐观地面对牺牲和死亡。与奥斯特利茨等战役不同,波罗底诺之战更多地写集体的英雄形象,而且不限于军队。斯摩棱斯克的商人烧毁店铺,莫斯科近郊农民焚烧饲料,莫斯科居民不惜牺牲一切而全体撤退,最后是游击队“举起棍棒”……作者以此表明这是一场人民战争,人民的意志是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力量,奥斯特利茨(那时人们“不知道为什么而战”)的失败正是反衬。

“人民”也包括某些将领,如巴格拉季翁。而最能代表并表达人民的精神和意志的是库图佐夫。他朴素而平易近人。作为统帅,他沉着果断,不考虑个人得失,肩负拯救祖国的重任。但作家

①② 《列·尼·托尔斯泰全集》,第13卷,第72页;第15卷,第241页。

③ 参阅安·萨布罗夫:《列·尼·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莫斯科大学出版社,1959年,第37页。

④ 《索·托尔斯泰日记》,莫斯科,1978年,上册,第502页。